

18.02

茶陵文史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茶陵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茶陵文史

第三辑

1988.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茶陵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七月

封面题字 刘道儒

封面设计 徐济春

茶 陵 文 史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茶陵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字数：140000 印数：1000 工本费3.00元

茶陵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八年七月

目 录

史志园地

- 茶陵城墙今昔……………吴 昆 刘斌盛 (1)
- 茶陵的箩脚行……………周敬德 (6)
- 茶陵的“乐善坛”……………肖一新 (12)
- 茶陵在省城的一所“寓考公馆”……………谭国政 谭材熙 (15)
- 茶陵的采茶戏……………刘振祥 (17)
- 己巳年水灾见闻……………吴 昆 (25)
- 修建小汾飞机场见闻……………段桂馥 (35)
- 南下纪实……………马征凯等 (42)

斗争风云

- 1926—1927年茶陵的农民运动……………文史办 (54)
- 大革命时期的茶陵工人运动……………周敬德 (69)
- 火烧陈载扬
——记红军游击队袭击三区区公所
……………刘铁僧 (78)

严塘大捷·····	彭自强 (82)
我参加“上海妇女反日大同盟”的回忆·····	谭珊英 (84)
回忆茶陵保卫战·····	陈德邵 (91)
护校迎解忆当年·····	谭叙伦 (96)
损财馓气农家泪 官衙何曾把冤伸 ——回忆旧时我家失盗的前前后后·····	桂 露 (103)

◎人物春秋◎

他是闪光的真金 ——谭醒烈士传略·····	朱汉兴 (107)
忆大姐谭道瑛·····	谭珊英口述 谭安利执笔 (122)
先父杨绍震生平述略·····	杨祖保 (133)
风雨相伴四十年 ——忆外欧·····	晨 虹 (139)
历经坎坷的彭柏山·····	龙书化 (151)
龙书金青少年时代二三事·····	龙书化 (157)
陈应炳先生传略·····	谭树德 (160)
谭延闿的青少年时代·····	龙书化 (162)
陈友柏先生的教书生涯·····	陈述祖 (167)
李友梅先生·····	曹端文 (169)

周纪勋先生事略·····	谭焜轩 周迪恺	(176)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张整维·····	彭立德	(184)
陈阵生平简介·····	陈咏涛 周培道	(190)
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颜逍鹏·····	陈咏涛 周耕耘	(204)
我的叔父刘柔远·····	刘育贤	(209)
从“恢公桥”话刘建绪·····	刘维驾	(214)

~~~~~ { 旧闻拾遗 } ~~~~~

漫话茶陵过去的鸦片馆·····	谭开元 李匡世	(222)
昔时的茶陵“化子院”·····	段绍焯	(228)
号称“罗汉”的赌徒李春生·····	尹勤茂	(233)
一个职业刽子手·····	佚名	(239)
陈光中在茶陵修筑的“烈士墓”·····	陈述祖	(241)
刘三吾检删《孟子》史话·····	罗敦福	(244)
对《我所知道的彭国栋》一文的补正·····	谭材熙	(246)

《南下纪实》附件：南下茶陵干部名册

茶陵城墙今昔

· 吴昆 刘斌盛 ·

茶陵城墙位于城关镇洙水河畔，洙水绕城，三面环流。墙体为条石结构，宏伟坚实，是茶陵有名的古建筑。

据《茶陵州志》记载：“城墙始建于宋绍定年间（即公元1228——1233年），知县刘子迈筑城，东南枕江，铸铁犀以杀水势。列木其下，填土其上。宋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城墙初具规模。元、明、清三朝相继修葺”。

城墙周长二千五百米，宽五米，高八米。“东南因江为险，西以北为濠”。濠深三点〇三米，宽二十一点六米。城原开五门：东有“东门”；西有“大西门”；西偏北有“小西门”；南有“南门”；北有“北门”。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289年），知县李士谦又将城墙加宽至八米。并在各城门上建有重楼，增以“月城”。城墙上环建“敌楼”八个，“角楼”四个，“更楼”二十二个。绕城城壕二千三百六十六个。清顺治年间（公元1644——1661年），知州周士先、马崇诏相继修葺五道城门，并正式给城门命名：东门为“聚星门”；大西门为“紫薇门”；小西门为“迎湘门”；南门为“迎薰门”；北门为“朝天门”。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6年），知州熊应昌在文庙（今茶陵二中处）前增开一门，命名为“大成门”。至此，环成辟有六个城门，成为县城四通八达的出入口。

清末民初，六个城门的名称，与《茶陵州志》所载，有所更异：东面曰“迎曦门”；北面曰“迎朔门”；西面的原小西门曰“迎翠门”；西面的原大西门曰“迎湘门”；南面的“迎薰门”仍旧；南面所增辟的大成门曰“榎星门”（后人又称为文星门，相沿至今）。六个城门的正面城门上，都悬嵌着用祁阳白色大理石、从右至左横刻的石碑门名。现今仅存者，惟人民街进出处之大西门洞有“迎湘门”一碑，其余五门的门名碑石均毁。

城之南，迎薰门与榎星门之间的城墙上，还建有“魁星楼”一座。据传说，系肖锦忠于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状元及第后，县人为崇奉“文曲星”而建。废科举后，由于风雨侵蚀，年久失修，该楼渐次颓朽，以致倾毁。解放初期，尚有残迹，迄今已湮没殆尽。

城墙之上的西南角，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建有一座四、五丈高的“哨楼”，为防护日本飞机轰炸，设“防空哨”于其上，以敲钟为讯号，专司发出“敌机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之用。抗战胜利后，楼拆。

大西门的“迎湘门”城墙上，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建有两层的六角挑檐式亭子一座。时值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为“进剿”红军，驻军茶陵。因刘别名“恢先”，当时茶陵的当权者，为了回敬刘对修桥的捐助，乃将亭命名为“恢公亭”。并将临城的三总桥（原为三元桥）也改称为“恢公桥”。伴亭之右，又建有三厢房的平房一幢。抗日战争初期，设“民众教育馆”于其中，内有图书、阅报、游艺等室。1944年夏，日军侵占县城后，我爱国军民于一次夜袭日军时，为撼摇敌人军心，放火烧毁了恢公亭。这

座建筑物，也就被历史淘汰了。

茶陵城墙内外都用大条石、由生豆浆拌和石灰垒砌而成，居中填黄土夯实。条石砌台的灰浆，其凝结的牢固程度，较条石尤为坚固，至今有的条石已被风化剥蚀，但缝隙灰浆尚完好不坠。原城壕所用的火砖长一·八市尺，厚五市寸，宽八市寸，并印有烧制时的朝代年号，据发掘尚有整块出现，砖的质量很高。城墙的东南沿环流的涑水而筑，西北则沿濠沟西立。详察地形，城墙之外的濠沟是因当年筑城时挖土填墙而形成的，实际上成为“护城河”。（相沿称为“汴河”，也叫做“濠河”）。年代久远，时移世易，城北一带的濠沟早已变为农田，惟城西一段，尚有割段蓄水的濠河残迹。

茶陵古城墙依涑水而建，既具有军事价值，墙体又起到防洪洪水作用。因此，为过去统治阶级据城而守的双重防线。

民国以来，由于兵器进化的日新月异，古城墙也就失去了“深沟高垒”的军事意义，城墙也就无人管理。城墙上原有的敌楼、角楼、更楼、城垛、以及用铁皮包裹的城门门板等等设施，均遭毁弃，一无所存。

大革命时期，茶陵当局，妄图防止红军攻城，曾一度把北门和小西门两个城门，用条石砖块封闭，其他四个城门，也添置过木料门板，梦想于必要时可以据守抗拒，但毕竟挡不住革命的洪流，茶陵城曾先后七次被红军攻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屏障之用的古城墙，随着时代的演进，也只能沦为万史陈迹而残留下来。但它作为防洪渠道、保护城内人民的生命财产，也还有其实用价值。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

年)，茶陵县政府曾经拨款，对一些坍塌缺口作过一次修缮，并打算在城墙之上，环城栽之以树，辟为环城林荫通道，因而将墙上凸凹不平的地段，挖高填低，使城墙原有高度经过千百年来的损毁与水土流失之后，又矮下了约一公尺。所栽之树，因无专人培护，无一成活。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扩展城乡交通，于1960年开辟严（严塘）尧（尧木）公路，勘定由现今的环城路经农林村，从城北挖开城墙缺口，直指城南，再挖开城墙缺口，在文星门原渡口处，修建了汽车板渡码头——“三七渡口”，通向严尧。城内从北到南这段直贯公路线为两公里。随着形势发展，1978年建成了洙江大桥，使县城至严尧的公路线改道，穿城而过的这段公路及“三七渡口”，也就随之废置了。

正由于城墙南北两处挖开了缺口，造成了拆除城墙的错觉，因而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城关镇的农林、县民两个大队，把城东的大沙洲，实行填土盖沙，改为水田。于1967年——1968年，从城墙东南角的史文头起至正北的城门口止，就近挖取城墙泥土，把原城墙的条石砖块，也被搬走作为修建渠道及蓄水池之用。继后，从北门绕至西城墙一带，又为近城的生产队搞集体副业以及农户建房，连年扮砖烧窑，把城泥全部挖掉了，整个城墙被毁掉四分之三以上；夷为平地的城墙基脚，也被附近村民盖上了新屋，出现了绕原城旧址的新建筑群。古城墙现今所存者，仅只从大西门至南门史文头、靠洙河的城墙一段，长约六百来米，仍起着挡水防洪的作用。

1981——1982年相继发生水灾，由于城墙被毁，洪水威胁了城内人民群众的安全。特别是南城墙之下的河堤，因长

年累月的洪水冲刷而逐渐崩陷，势必危及靠河城墙基脚，县委和人民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于1982年拨款动工，对沿堤的坍塌缺口，作了加固整修。同时在文星门处的城墙下，就原址新建了一座“铁牛亭”，使我县这个俗称为“铁牛”的名胜古迹，既保存了原貌，也增添了新姿。

茶陵的箩脚行

· 周敬德 ·

箩脚行的起源

茶陵早在清朝时代就有服务性的苦力行会。先是从事装卸、搬运，以后逐渐形成箩脚行也。

据考，茶陵箩脚行的创始人，是申瑶（今属涑江乡）唐定生。此人“肩挑五百，力能伏虎”。说他有一次去老虎山的垅上砍柴（今思聪乡境内），突遇猛虎，凭他一身力气，与虎搏斗，竟将老虎打死了。这还不算，他还将死虎捆上柴担挑回家来，经人过秤，虎重一百一十多斤，柴重三百多斤。村人见他有如此“神力”，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唐广老古”。意思是说他具有“广老古”的力气。

昔时农村，每到农闲时，大多数农民无所事事。为谋求家用补助之需，唐定生串联了村里十几个有力气的年轻人，来到县城卖劳力，落脚于涑江河边的灵官庙，专替县属机关和商家铺户装卸船运货物，藉以挣点力资。那时搬运东西，尽用箩筐肩挑、背驮，别无其他运具。因用箩装脚走，所以就把这个行业叫做“箩脚”，也有称之为“脚行”的。

唐定生死后，下瑶的李启告、陈兴虎、陈明福等人承袭下来。苦力工人已发展到三十余人，继续在灵官庙码头搞箩脚搬运。不久，县城八总街一带（今工农路）的闲散劳力，眼红箩脚这一挣钱的门路，于是由士绅刘紫城、马晓斋等出

面，打着替县城八总街老百姓谋生的招牌，藉口灵官庙码头是属于县城范围的所在地，决意抢占灵官庙码头，赶走下瑶的箩脚工，结果酿成械斗。下瑶的箩脚工，个个孔武有力，有的还会武功。经过几次斗殴较量，八总街斗不过下瑶，只好偃旗息鼓，打消了企图抢占码头的念头。从此，灵官庙码头这一搬运活计乃独归下瑶人营业，再也无人觊觎这块“猪肉”了。久而久之，由操箩脚业者自发形成的这一行业，也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至今，下瑶和中瑶的人们，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箩脚行是打行”。这就是说，当年箩脚行这个“饭碗”是凭武力得来的。

箩脚行组织的变迁

从事箩脚行的苦力工人，曾经先后有过“苦力工会”与“箩脚工会”的组织。这是茶陵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性质的劳工团体。

1926年北伐军经过茶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茶陵工农运动蓬勃兴起。这年十月间先后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等群众组织。县总工会成立后，很快就发展了缝纫、泥木、民船、造船、苦力、油漆、店员、厨师等八个基层工会，共有会员一千一百多人。当时，由箩脚工人成立的“苦力工会”会员共有四十多名，推选下瑶的陈忠仔担任委员长。

1927年“马日事变”后，攸县反动头目罗定受军阀许克祥的派遣，占驻攸县，窥伺茶陵。为了打击其嚣张气焰，苦力工会委员长陈忠仔立即响应上级号召，带领苦力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一道，组成两百多人的工人武装，在县总工会委

员长王友德的率领下，进军到攸县，配合攸、醴两县的工农武装，奋力攻打罗定，曾一度挫败了罗部。六月间，罗定卷土重来，突犯茶陵。一进城就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其时，好几百个工农运动骨干都惨遭杀害。苦力工会的陈忠仔、陈运仔、陈九仔、雷凤仔等十八人也同时全部遇难。从此，阴霾漫空，白色恐怖笼罩茶陵，曾经一度激荡风云的工农运动，至此趋于低潮。

大革命失败后，灵官庙码头的搬运业务，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1930年，下瑶陈赞治又接着插手箩脚行业。陈赞治又名陈克从，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回县后混身政界，成了瑶里一带颇有名望的“叫鸡公”。他为了牢笼群众，巩固其统治地位，打着恢复瑶里人从事箩脚搬运传统的招牌，由他出面采取“买扁担”和“租扁担”的方式，凑拢六十三根扁担（一人一扁担，即六十三人）于翌年五月，经当局政府批准，在灵官庙开会，正式成立箩脚工会，选出了“领导班子”，下瑶陈永连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

继后，经过好几次换届。由于旧时搬运工人处于社会底层，虽有自己的团体组织，但因大都是文盲，觉悟不高，所以遇事还是不能“当家作主”。而那些豪绅地霸，却凭借手中的权力，以保护“瑶里人搬运权利”的“卫士”自居，争相插手其间，实际上是操纵、垄断搬运工会的后台老板。他们先后有陈赞治、陈若川、陈永安、龙跃海、肖文蔚等。

箩脚工会从1931年成立起，至1949年解放时止，曾先后五次换届。其届别、时间及人事组织情况，列表于下：

届别	时间	理 事 长	常 务 理 事	监 事
第一届	1931年	陈永连	陈吉吉 曾件仔	龙冬发 陈端仔
第二届	1937年	陈吉吉	罗菊生 曾件仔	龙冬发 陈端仔
第三届	1938年	龙冬发	罗菊生 陈庚古	陈谋冬 陈宋仔
第四届	1946年	陈志圣	罗菊生 陈冬仔	龙冬发 陈宋仔
第五届	1949年	罗菊生	陈为琮 ×××	龙冬发 ×××

箩脚工人的苦难

大革命失败后的工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官僚掠夺，加上土豪劣绅和封建把头的压迫、盘剥，使他们长期处于社会最低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时，箩脚工人哀叹自己的悲惨处境，曾流传着这样

一首歌谣：“肩挑一百八，放下扁担冒饭吃；背扛两百斤，家里饿死老母亲”。

且看：1931年，陈赞治倡首成立箩脚工会时，规定凡加入箩脚工会者都要出钱“买扁担”，一根扁担就是一名会员，买一根扁担须缴银洋十四元，这样就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地实行世袭继承。不缴钱买扁担的，就没有入码头搞搬运的资格。据县搬运公司退休工人尹毛仔回忆说：“我是攸县菜花坪人，1948年躲壮丁逃来茶陵，无以谋生，花了一石大米（时值银洋四元）和三元现洋，托人说情，才买到一根扁担的名额，加入了箩脚工会”。

与此同时，箩脚工会的后台老板和头头们，还另出“花招”：他们把无人继承的“扁担”权，据为己有；本身不参加劳动，以出租方式，把名额租给一些无钱入会的农民搞临时搬运，名曰“租扁担”。那时，租一根扁担，每年要交两块银洋的“租金”（抗战时期改为两石谷）。这种出租“扁担”的权利，不搞继承，租主可以随时收回。——这实际犹如地主出租田地一样。

此外，对箩脚工人平日凭汗水挣得的力资，还要按“三七”分成，工人只得70%，尚有30%名义上作工会收入，实际上是由后台老板与头头们以种种藉口而鲸吞了。

据老工人回忆，当年汽车站的搬运业务分两个工种，一是挑担，二是抬轿。当时，车站搞搬运工的有三十人，工人们每天挨次排班，相互轮派。有的跑高陵、秩堂、界化垅、严塘、湖口、界首，有的去鄱县、宁岗、莲花、永新。他们顶风冒雨，翻山越岭，一天也只能得到一、两元力资的七成，而头头们却不劳而获，抽得了三十人的三成。这种剥削

是非常残酷的。

箩脚工人那时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但在经济上除了受剥削外，政治上受迫害也是深重的，有时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当年国民党军队经过县境时，往往要通过县政府指定派“伕”，而箩脚工人恰好是派伕的对象。被派出当伕子的，固然被迫不能搞搬运活计；而未被轮派的，也是提心吊胆，东躲西藏，月无宁日。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兵役的卖买顶替之风盛行，乡保长与地方豪劣，互相勾结，横行无忌。官府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灵官庙码头因属于首善镇管辖之内，首善镇公所也就毫无顾忌地常来箩脚行“捉羊抵鹿”。记得搬运工人覃冬来（下瑶人）、陈这苟（中瑶人）被抓走后，一直杳无音信，很可能早已葬身异乡了。

箩脚行那些“后台老板”们，平日沾尽了搬运工会的便宜，但如遇上什么风波，却又无能保护箩脚工人的合法权益。如：1948年5月间，县城某大商号老板曹××贩运大米出境，搞投机倒把生意，按规定应由码头搬运工人装车，可他因有当警察局长的妹夫帮忙，却派了一些警察替他搬运。工人们迫于生计，非常激愤，一边搬了些木料拦住汽车，一边以箩脚工会的名义请县参议员龙××出面讲理。不料，这位一贯作为搬运工会的所谓“后台老板”，此时却避而不见。而那些荷枪实弹赶来护车的武装警察，倒把拦车的搬运工人抓去了好几个。搬运工人赤手空拳，既无力抗争，又无处申诉，只得忍气吞声，眼睁睁地让运米的汽车开走了。

从箩脚行业的历史概貌及箩脚工人的苦难生活来看，旧社会的黑暗真是罄竹难书！